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要素流动与贸易收益

——外资流入下贸易发展的国民收益

周琢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要素流动与贸易收益

——外资流入下贸易发展的国民收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要素流动与贸易收益:外资流入下贸易发展的国民
收益/周琢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新开放论丛/张幼文,徐明棋主编)

ISBN 978-7-5520-0491-5

I. ①要… II. ①周… III. ①对外贸易-研究-中国
IV. ①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9955 号



要素流动与贸易收益

——外资流入下贸易发展的国民收益

著 者:周 琢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4

插 页:2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91-5 / F·213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5—10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

一、以完成 BIT 谈判和参加 TPP 合作为动力构建 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

度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能够有效地倒逼机制、推进改革。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中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 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

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

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

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 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 30 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制宜。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

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實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张幼文 徐明棋

2013年9月

目 录

总序	001
绪论	00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002
二、选题的背景以及意义	002
三、本书研究的总体思路及章节安排	005
四、本书可能的创新点	007
 第一章 文献综述：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收益	011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012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创造	012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	015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	017
第三节 国际贸易对东道国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	020
一、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收益影响的理论探讨	020
二、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收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022
第四节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031
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031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032
三、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034
 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国际贸易形态和特征	035
第一节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概述	036

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036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及跨国全球战略	039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国际贸易发生的机制和内涵	047
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生产要素集聚	048
二、生产要素集聚下的外资企业中间品出口	051
三、生产要素集聚下的一国显性比较优势	059
四、生产要素集聚下一国出口产品中的要素密集度和本国要素含量	063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下国际分工的新特征	068
一、国际分工的历史演进	068
二、国际分工的理论发展	069
三、国际分工的新特征——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	070
第三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贸易收益原理	073
第一节 贸易利益观的逻辑和内涵	074
一、贸易量决定贸易利益	074
二、国际分工决定贸易利益	075
三、要素禀赋决定贸易利益	077
第二节 贸易收益观的形成与发展	078
一、贸易收益观的形成	078
二、贸易收益观的发展	081
第三节 国内关于对外贸易收益问题的讨论	084
第四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东道国出口贸易增加值	087
第一节 出口贸易增加值的相关概念	088

第二节 东道国要素投入对其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091
一、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全球生产要素的区位分布	091
二、东道国要素投入对其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103
第三节 外资企业要素投入对其行业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110
一、外资企业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测定方法	110
二、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112
第四节 苹果公司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研究	116
第五节 按要素所有权测算的东道国出口贸易增加值	121
一、现有的测算方法	121
二、按要素所有权测算的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	122
三、外资企业出口对不同要素增加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125
 第五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要素收益差异决定原理	135
第一节 引言	136
第二节 模型分析	138
一、生产者行为	139
二、消费者行为	141
三、市场环境	141
四、比较静态分析	143
五、要素稀缺性与要素的相对收益	154
第三节 小结	156

第六章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下的生产要素收益实证研究	159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不同要素收益实证分析	160
一、回归方程	160
二、数据说明	161
三、计量方法	163
四、实证结果	163
第二节 基于面板模型的不同要素收益实证分析	167
一、回归方程	167
二、数据说明	168
三、计量方法	170
四、实证结果	171
第三节 小结	180
结论	189
一、主要结论	190
二、相关启示	191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208

绪 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改变了一国国境内原先的要素禀赋,进而影响了一国的生产模式和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不同,生产要素跨境流入国的贸易主体表现为外资企业,贸易模式为加工贸易,贸易中所含的生产要素不再仅为本国生产要素,而是既含有本国要素又包括外国要素。贸易从原先由一国提供要素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交换,转化为由多国要素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交换。那么在各国生产要素合作生产进而出口的背景下,一国贸易收益是什么?如何衡量一国贸易的收益?一国贸易收益的相对大小由什么因素所决定?本书将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对一国国际贸易产生了何种影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下一国国际贸易的形态是什么?由此所形成的国际分工有何新特征?

第二,国际贸易利益和国际贸易收益两大概念有何区别和联系?一国贸易出口增加值如何反映一国贸易收益?新贸易形态下的一国贸易收益如何计算?一国贸易增加值的大小由哪些因素决定?

第三,一国贸易增加值的实质是什么?包含在外资企业出口产品中的生产要素,其要素收益如何决定?外资企业出口对不同种类要素收益的影响是否验证了以上生产要素收益决定原理?

二、选题的背景以及意义

1. 国际贸易的新现实

在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背景下,一国贸易额不再仅反映本国要素生产并出口下的国际贸易。一国的国际贸易表现为投资贸易一体化形成的公司内贸易和由离岸外包所形成的加工贸易。2009年,美国48%的进口和30%的出口为公司内贸易,全球1/3的贸易为公司内贸易。根据 Helpman(2006)

的测算,剔除石油贸易,全球 2 / 3 的贸易为公司内贸易。2010 年,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为 47%。Miroudot 和 Ragoussis(2009)认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中间品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为 56.2%,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为 73.2%。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上以本国要素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并形成的要素合作生产。2007 年,跨国公司的生产规模为 31.2 万亿美元,约占当年世界生产总值的 57.2%,其中跨国公司海外分支结构的出口额为 5.72 万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 40.85%。

国际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的下降加之各国政府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跨国公司可将其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合理切割,通过离岸和外包的形式将生产环节在全球不同国家间进行有效配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往往将产品的最终组装国简单地理解为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夸大了产品组装国的贸易收益,以中国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为例,其国内贸易增加值从 1998 年开始不断走低,2011 年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国内增加值下降为 14.35%。

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一国贸易差额不再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从一国的贸易差额中判断一国的贸易收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使得各国生产要素可在某国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对某种产品实现专业化生产(张幼文,2007)。一国的出口产品不再由一国生产要素所创造,而是各国生产要素合作生产的结果。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要素合作的组织形式和载体,其 2012 年出口额为 10 227.48 亿美元,进口额为 8 712.49 亿美元,计入在中国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顺差额为 1 514.99 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贸易顺差额的 65.55%。因此,以一国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统计方法已经难以客观地反映全球价值链中一国实际的贸易收益情况。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贸易统计中存在着大量中间品贸易,这也造成了大量贸易额重复计算,从而不能真正反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现状。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指出,2007 年中美贸易顺差将比按现行贸易总额测算方法测算的贸易顺差少 60%左右。就世界贸易组织估算 2008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言,现行统计数据是 2 850 亿美元,如按增加值核算,并对中国加工贸易进行调整,该差额缩减为 1 650 亿美元,只相当于传统数据的 58%。以产品 Iphone4 的贸易为例,中国出口